

《郡斋读书志》的分类 及其与《崇文总目》的关系

郝润华

[摘要]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解题式私家书目，它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5类，分类科学、体例完善。它的分类是在充分吸收和参考《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北宋私家书目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如前人所说只依据了《崇文总目》。

[关键词] 《郡斋读书志》；分类；《崇文总目》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6)05—0156—06

[作者简介] 郝润华，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 730070

我国目录学自汉刘歆《七略》至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就形成了“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之后，经、史、子、集四分法占了主要地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书目均以四部分类。宋代晁公武编《郡斋读书志》总结“七分法”和“四分法”的优劣，继承和参考《隋书·经籍志》等书的分类传统，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图书情况，作了适当改进，创立了自己的分类法，如，由于史书和文集比以前大大增加，如果仍依照“七分”法，势必多寡不均，所以《郡斋读书志》采用“四分法”，即分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又分45类。晁公武在总序中概述了从《七略》六分法到《晋中经新簿》四分法的演变，并且说明了选择四分法的缘由，“今予所录书，史、集猥众，若依《七略》则多寡不均，故亦分为四部焉”。《郡斋读书志》分类如下：

经部10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经解类、小学类。

史部13类：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史评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传记类、谱牒类、书目类。

子部18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天文类、星历类、五行类、兵家类、类书类、杂艺术类、医学类、神仙类、释书类。

集部4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文说类。

《郡斋读书志》将图书分为四部45类，是十分合理科学的。晁公武认为：“《论语》、《孝经》自班固以来，皆附经类。”因为《论语》是“群言之首”，《孝经》是“百行之宗”，放在经部，是完全正确的。小学类仍依照《汉书·艺文志》，放在经部。他认为经解类是“有补于经而无所系属”，因而亦放入经部。集部中别集类的书特别多，所以晁公武再分为上、中、下三部。

《郡斋读书志》在类别设置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史评类和文说类的设立。首先，在史部设史评类，在目录书中首次为史学批评著作找到了归宿。根据晁公武的解释，所谓史评，是指集部文史类著作中的“论史者”。被晁公武归入史评之下的史学著作，既有以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为评论对象的历史评论著作，如《历代史赞论》、《唐史要论》、《唐鉴》等，也有直接以史学本身为评论对象的狭义上的史学评论著作，如唐刘知几的《史通》。这一类目的设置对后世影响巨大，稍后的宋高似孙《史略》，以及清代

该文所引均以衢本《郡斋读书志》为准。孙猛整理《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修《四库全书总目》、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均列有“史评”一类。晁公武根据学术发展的需要，在集部又增设了文说类，使历代文学批评著作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不再出于总集的从属地位，在我国古籍分类中，终于完成了对文学批评著作的安置。这也是晁公武的独创。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类，即渊源于此。

一般认为，《郡斋读书志》的分类是依照北宋时官修的《崇文总目》而成，究竟是否如此，笔者对此作一些较深入的考察。

一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朝廷命翰林学士王尧臣、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以崇文三馆（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及秘阁所藏的图书，仿唐代元行冲等所编《开元四部录》体例，编修《崇文总目》，该书目于庆历元年（1041年）修成。王应麟《玉海》卷52《庆历崇文总目》称其体例“以四库书并合著录”，分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又分45类，即经部9类，史部13类，子部20类，集部3类，共66卷，收书30669卷。《崇文总目》每类都有小序，辨别源流。《四库全书总目》卷85史部目录类称其“每条之下具有论说”，即每书有解题，提要勾玄。《崇文总目》对宋代的图书补缺和辨别图书存亡、真伪等起了很大作用。

《崇文总目》尽管代表了宋代官修目录的最高水准，也具有一定的目录学价值，但由于其编纂动机是为了贯彻统治阶级的“文治”思想，标示统治者的右文崇儒，体现皇家藏书的丰富，因此，它的解题的学术性远远不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晁公武作为一名学者，他编《郡斋读书志》是依据个人藏书，并对这些藏书有过仔细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撰写解题十分重视学术性与文献信息量，而《崇文总目》的编修动机是为显示宋王朝藏书的丰富、宋代文运的隆替和体现统治者对“文教”的重视，所以，在解题的撰写上侧重点明显不同。据有学者统计，《崇文总目》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1、标明撰注者；2、概述写作缘起；3、略述内容；4、评点学术价值；5、解释书名。《崇文总目》叙录或取一个方面，或连类兼及几个方面，在159条解题中，占一个方面的有45条；两个方面的有71条（其中60条仅点明撰注者及另一方面）；三个方面的有41条；四个方面的有2条。同样按上面的标准统计，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经部178条解题，占一个方面的有10条；占两个方面的有91条；占三个方面的有65条；占四个方面的有10条；占五个方面的有2条。显而易见，《郡斋读书志》解题所蕴含的文献信息量远较《崇文总目》丰富，与《郡斋读书志》的学术质量相比，《崇文总目》只略似于一个藏书簿记。并且《崇文总目》的解题乃“众手为之”，质量参差不齐，徽宗时秘书郎黄伯思仅就作者方面的考证即达10多条，其后郑樵在《通志》里的否定自不待言，宋末王应麟在《玉海》中也以“多所谬误”按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曾指责《崇文总目》的缺失。像王应麟、郑樵、李焘等人都亲眼看过《崇文总目》，他们的评价有文本依据，客观性更强，不会是故意曲解。所以，可以初步认为，由于《崇文总目》在分类和叙录方面缺点较多，并未得到当时人的称赞。

既然《崇文总目》学术性差强人意，又不被当时学者所称赞，那么，作为目录学家的晁公武怎么会以它为依据来编纂《郡斋读书志》呢？

考察整部《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自己并没说过他编《郡斋读书志》是依据《崇文总目》的话。在《郡斋读书志序》中只是说：“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雘校舛误，每终篇輒撮其大指论之，岂敢効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袁本为：“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雘校舛误，每终篇輒撮其大指论之，岂敢効王、宋之博，所期者家声是继而已。”这里的“王”是指王尧臣，“宋”是指宋祁，此二人都参加了《崇文总目》的编修。关于《崇文总目》的成书经过，据《玉海》卷52记载：“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其书总数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

罗凌：《崇文总目 繁本系统散佚探源》，载《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5期。

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至是上奏之。”关于《崇文总目》的修撰者，后人一般都说是王尧臣、欧阳修等撰。此外，《崇文总目》除署名编撰者王尧臣外，实际上，参与撰修的学者还有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张观、宋庠、李淑、宋祁等，而其中欧阳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于后人多题王尧臣或欧阳修编撰，是因为前者的官位高，且领衔上进，据学者研究，《崇文总目》中的小序，一半是出自欧阳修之手。为何晁公武在《序》中不提学识渊博而声望又高的欧阳修，而独说“王、宋”或“二、三子”呢？语气似乎颇有意味。我们将这两位人物稍作分析。王尧臣(1003—1058年)，字伯庸，应天虞城(今河南商丘)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通判湖州。历任擢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职，后迁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为群牧使。皇佑三年(1051年)充枢密副使，深得仁宗信任。至和三年(1056年)拜参知政事，仁宗欲提为枢密使，为胡宿所抑。嘉佑三年(1058年)迁吏部侍郎，八月卒，赠尚书左仆射，年56。谥文安。《宋史》卷292有传。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迁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初与兄宋庠同举进士，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纂《新唐书》，旋出知亳州。十余年间，每出必以史稿相随，《新唐书》成，迁右丞相兼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卒谥景文。宋祁明吏治，精史学，工诗词，除参加编修《崇文总目》外，还著有《大乐图》2卷、《益都方物略》、《宋景文笔记》、《宋景文集》等。至此，就可以知道，晁公武之所以提王尧臣与宋祁，是因为这二人在当时官位重、地位高，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很有目录学成就，但在晁公武的眼里，他们的成就不一定突出。晁公武之所以提到他们，只是表示他们主持了《崇文总目》的编修，而且，《崇文总目》在当时影响很大。

最早将《郡斋读书志》与《崇文总目》联系起来的是清人朱彝尊，其《经义考》卷290云：“按《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目录类小序也说：“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之。自是以后，遂两体并行。”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一句，似乎是相沿朱彝尊《经义考》的说法。这种说法基本是正确的，但却只说对了一半。

《郡斋读书志》解题提到《崇文总目》有30多条，如，《周易微指》解题云：“右唐陆希声撰。……此《微旨》也，皆设问答。《崇文目》止有二篇。”又，《春秋公羊疏》解题云：“右不著撰人。李献民云徐彦撰，亦不详何代人也。《崇文总目》谓其“援证浅局，出于近世”。以何氏三科九旨为宗，本其说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尔。总而言之，谓之三科；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从这些解题中并不能看出晁公武对《崇文总目》的效法和模仿。更何况《郡斋读书志》提到的书目还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邯郸书目》、《田氏书目》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这些书目都有引用。晁公武编《郡斋读书志》时对《崇文总目》有所参考，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作为一部宋代有解题的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也有许多优点，如在子部专设道书类与释书类，特别是道书，不仅著录多，而且分类细。因此，郑樵赞美它极有条理，云：

《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道书一类有九节，九节相属，而无杂柔。

但这并不意味着《郡斋读书志》仅仅依据它进行分类。

二

实际上，晁公武编《郡斋读书志》时依据和参考了之前的许多书目，包括《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包括《崇文总目》及北宋的一些私家书目。只要将

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页。

《通志·校讎略·崇文明于两类论》，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郡斋读书志》与这些书目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郡斋读书志》是在对前人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的，所以，我们需要将《郡斋读书志》与几部唐宋时期重要书目的分类做一些比较，以便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崇文总目》	《郡斋读书志》
经部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讖纬10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讖纬、经解、诂训、小学12类。	易、书、诗、礼数、乐、春秋、孝经、论语、讖纬、经解、小学11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9类。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解、小学10类。
史部	正史、古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杂史、起居注13类。	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13类。	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杂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13类。	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职官、仪注、刑法、地理、氏族、岁时、传记、目录13类。	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史评、职官、仪注、刑法、地理、传记、谱牒、目录13类。
子部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类。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事类、经脉、医术17类。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类书、明堂经脉、医术17类。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书、类书、算术、道书、医书、卜筮、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释书、艺术20类。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星历、五行、兵、类书、艺术、医书、神仙、释书18类。
集部	楚辞、别集、总集3类	楚辞、别集、总集3类	楚辞、别集、总集3类	楚辞、别集、总集、文史4类	楚辞、别集、总集、文史4类

注：以上《郡斋读书志》分类以衢本为主。

从上表可以看出：《郡斋读书志》的经部，吸收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仍分为10类，而只有《崇文总目》分为9类，少经解类，晁公武认为，经解类是“有补于经而无所所属”，因而应该列入经部。史部，比《崇文总目》多了史评类和谱牒类，前者是晁公武的独创，后者则是《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原有的类目。子部，比《崇文总目》多了艺术类，显然是沿袭《旧唐书·经籍志》的杂艺术类而来，天文、星历二类则是延续《隋书·经籍志》将以往书目的天文、历数而来。又创设神仙类与释书类，使道教、佛教书籍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关于这两类的设置，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受到《崇文总目》的影响，因为《崇文总目》有道书和释书两类。其实，顺应唐代高度发展的佛教、道教形势，目录学家毋斐就编了《开元内外经录》10卷，“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篆，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使道教、佛教典籍有了归属，结束了以前书目中佛道典籍处于从属地位的局面。说明毋斐对当时图书情况和学术发展状况的准确把握，也体现了毋斐对佛教、道教典籍文献的理解态度。所以，应该说《郡斋读书志》设这二类是对唐代毋斐的分类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此后的《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都模仿《郡斋读书志》，将道佛著作均各专设一类于子部。集部，前三个类目完全继承《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在此之上增加了文说类，是受到唐代吴兢《西斋书目》与《崇文总目》文史类的影响，而又有所创新。《崇文总目》有文史类，但没有楚词类，晁公武认为，楚词是“百代词章之祖”，故应设立一类，《隋书·经籍志》与两唐书《志》都因此有楚辞类。以后的书目，无论官私均设有楚辞类，当是受到《郡斋读书志》的影响。

以下再作详细分析：

1、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等类，《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均有，而归属有所不同：《隋书·经籍志》附训诂之书于论语类

末,《郡斋读书志》则入小学类。《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有讖纬类,而《郡斋读书志》无。《隋书·经籍志》及《崇文总目》无经解类,以之附于论语类末,《郡斋读书志》则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别为一类。

2、史部:史部的分类,晁公武参考了《崇文总目》,并做了一些修订,如去除了《崇文总目》的氏族类和岁时类,增加了史评类和谱牒类,但基本上是沿袭以前分类。正史类、杂史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各志名称均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的编年类,即《隋书·经籍志》的古史类;《隋书·经籍志》的霸史类,即《郡斋读书志》的伪史类;《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起居注类,《崇文总目》改为实录类,《郡斋读书志》承用之,也称实录类;《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的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改为杂传记类,《崇文总目》改称传记类,《郡斋读书志》承用之,也称传记类;谱牒类,《隋书·经籍志》称谱系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改称谱牒类,《崇文总目》则改称氏族类,《郡斋读书志》承新、旧《唐志》,称谱牒类;《隋书·经籍志》的簿录类,《旧唐书·经籍志》改称目录类,《郡斋读书志》沿用《旧唐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有旧事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故事类,《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均无;《郡斋读书志》有史评类,录《刘氏史通》、《史通析微》、《史记索隐》、《历代史赞论》、《唐书直笔》、《唐书新例须知》、《唐书音训》、《唐书音义》、《唐史要论》、《唐鉴》、《古史》、《两汉博闻》、《三刘汉书》、《东汉刊误》、《吕氏前汉论》、《晋书指掌》、《唐书辨证》、《五代史纂误》、《注唐纪》、《历代史辨志》、《西汉发挥》、《三国人物论》、《唐史评》等23部书,这是《郡斋读书志》的发明,说明他对史学批评的重视。

3、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五行诸类名,各《志》并同。兵家,《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称兵书类,《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称兵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天文、历数分列,《崇文总目》分之算术、卜筮、天文占术、历数等四类,至《郡斋读书志》则合并为天文、星历二类;《旧唐书·经籍志》的事类,《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改为类书类,《郡斋读书志》也称类书类;《隋书·经籍志》的医方类,《旧唐书·经籍志》分为经脉、医术二类,《新唐书·艺文志》又将经脉类改为明堂经脉类,至《崇文总目》并为医书类,《郡斋读书志》也称医书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杂艺术类,《崇文总目》省称艺术类,《郡斋读书志》也称艺术类;《崇文总目》有道书类、释书类,《郡斋读书志》称神仙类和释书类。

4、集部:《郡斋读书志》除因袭《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分类,有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之外,又增加了文说类,《崇文总目》有文史类,但包括史评之书,《郡斋读书志》则纯收诗文评之书,是晁公武的发明。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郡斋读书志》的分类大多承袭前人,只是其名称略有改易或有所分合去取而已。史部的史评类,虽不是晁公武的独创,但将其列于史部,则是晁公武的创造。吴兢《西斋书目》首创“文史类”,后为宋代《崇文总目》所沿袭,但“文史”一类,虽名兼“文”“史”,而其实是有“文”无“史”,即仅收评论诗文的著作,而讨论史学的则不在其中,《崇文总目》即将《史通》等史评著作归入史部“杂史类”。这个缺陷,是史评作为独立学科之初特质不明而造成的。与《崇文总目》几乎同时的《新唐志》则作了必要的修正,将“文史类”由诗文评扩大到史评,将原来混杂在“杂史类”的史评著作也归入到了“文史类”,但由于《新唐志》受到所采用的《古今书录》的分类框架的限制,“文史”一类并未独立设目,而只是附在“总集类”中。其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再设“文史类”都继承了欧阳修的“文”“史”兼收的思想。但“文”“史”兼收,也有不妥,就是将史部的著作——“史评”移到了集部,使“史”“集”二部出现了纠葛。对于这个矛盾,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他在史部设置“史评类”,在集部增设“文说类”,专门著录自《文心雕龙》之后的文论典籍,比起《崇文总目》的“文史类”著录文论、史论要具体、明确和细致的多,终于为诗文评与史评著作分别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5页。

找到了合适的归宿。其后尤袤继承了晁公武的这一分类思想,在其《遂初堂书目》史部与集部中分别设立“史学”与“文史类”(沿用旧目,但内涵与晁氏“文说类”同)。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继承晁公武的分类方法,设“诗文评类”,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类图书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是晁公武的发明,也是他对目录学的一大贡献。子部的神仙类,虽然是接受《崇文总目》的道书类而来,但宋以后的目录书有神仙类,实际是受了《郡斋读书志》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来看,《郡斋读书志》的分类显然不是简单承袭《崇文总目》而来,它基本上延续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又有所创新和改造,尤其是《旧唐书·经籍志》对它影响较大,而《旧唐书·经籍志》又是根据《古今书录》编成的,所以,也不排除晁公武对毋斐《古今书录》及李淑《邯郸书目》的参考。

北宋李淑《邯郸图书志》,又称《李氏书目》,也简称《邯郸书目》。李淑将家藏图书分为经、史、子、集4部,57类。著录图书1836部,23186卷。每书有较详细的解题,说明文献的作者、内容、体例、存佚等情况,可资后人借鉴者甚多。此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等附于后,《道书志》又分4类:经诂类、传录类、丹药类、符篆类。加上前面的经、史、子、集4部,实将图书分为8类。在当时是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一部著名的私家书目。既继承《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又冲破了它的束缚。《隋书·经籍志》以来,明确见于著录,分类摆脱四分法的综合性书目,以《邯郸图书志》为最早。后来的郑樵著《通志·艺文略》即是受到《邯郸图书志》分类的影响,完全摆脱传统四分法,将图书分为12部82类。《郡斋读书志》全书有20多处引用或论及《邯郸图书志》,在分类和解题的撰写方面都应给予了晁公武以启发,可惜这部书目已经散佚,不能确切考察他对《郡斋读书志》的影响。

《古今书录》,则是由唐代目录学家毋斐编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元行冲等人编成《群书四部录》200卷,但毋斐认为它著录书不够完备,体例也不尽善。于是在其基础上充实资料,增加书目,制定新的更科学的编纂体例,“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在开元九年(721年)编成《古今书录》40卷,可惜书已亡佚,但从《旧唐书·经籍志》中所载的毋斐《序》中可知,《古今书录》的体例甚为完备,《旧唐书·经籍志》总序称《古今书录》“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可见,《古今书录》经、史、子、集,每部有大序;每类有小序;著录的3006部书,每书有作者姓名。既能达到“剖判条源、甄明科部”,使读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目的,又使书目创作体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古今书录》贯穿了毋斐的目录学思想,这一点,既是《古今书录》质量上乘的保证,也是后人信服和称赞它的原因。五代晋刘昫主持编纂《旧唐书·经籍志》、北宋欧阳修编《新唐书·艺文志》时都依据和参考了毋斐的《古今书录》。晁公武在解题撰写方面受《古今书录》启发很大,比如,注重作者朝代及生平事迹的介绍。无疑,在分类方面晁公武也一定受到过他的影响。

以上两部书目是唐宋时期十分重要,又颇具特色的书目,体例完善、分类科学而新颖,晁公武编《郡斋读书志》时对他们有所参考,是合乎情理的。而《隋书·经籍志》、两《唐书志》等都是在《郡斋读书志》之前完成的有着较高质量的史志目录,它们都可能成为晁公武的参考文献,因此,《郡斋读书志》所依据的蓝本就不仅仅只有《崇文总目》一部。

(责任编辑:陈 磊)

Towards the *Tie Quan System* in Ming Dynasty

ZHU Zi-yan

At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solidify the imperial power and draw in the people with great exploits, Zhu Yuanzhang the emperor established the *Tie Quan System*, which was the most complete on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unction of Tie Quan changed as the times and the will of emperors changed. The *Tie Quan System* reflected from an aspect the imperial politics of Ming dynasty.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Mode of Miao Nationality-with the marriage customs of people of Miao Nationality in Wenshan, Yunnan as a case study

CHEN Shi-rong

People of Miao Nationality in Wenshan formed their special marriage mode during year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which was displayed both in love and wedding. We should inherit its positive aspects and give up the negative ones in dealing with the marriage mode of Miao nationality, endowing its marriage ethics with new contents and concepts.

The Obtainment of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WANG Jia-fan

This paper, by reviewing the life and research of the author who wrote the book *The National Power and Historical Change of Chinese Economy*, reveals that without the pains from reading history, we cannot get any inspiration of any cues of history.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put up many new ideas on Great Power Effect, System Cost and Financial Market, showing how to focus on the financial taxation and the following energy dissipation effe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linkag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The Classification of *Jun Zhai Du Shu Zh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ong Wen Zong Mu*

HAO Run-hua

Jun Zhai Du Shu Zhi by Chao Gongwu was so far the first existing problem-solving style private book. It scientifically and completely classified the books into four parts as Jing, Shi, Zi, Ji, with 45 categories. The classification was based on the study and reference to such books as *Sui Shu Jing Jizhi*, *Gu Jin Shu Lu*, *Chong Wen Zong Mu* and so on, not only the *Chong Wen Zong Mu* as former scholars estimated.

The Discovery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My Biography* in Chapters by Huizhou Businessmen

WANG Zhen-zhong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research into the writing, copying and the resource of *My Biography* in chapters by Anhui businessmen. It also analyzes the special academic value of the boo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is is the only book that has been written by Anhui businessmen to narrate its family history, and its on-the-spot style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to the social-cultural researches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lassification of Documents of Letters in Qing Dynasty and Their Historical Value

Zou Zhen-huan

There were superior in numbers of documents of letters in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documents of letters, the article classifies documents of letters according to home letters, friendship letters, learning letters, love letters, religious letters, woman letters, official letters and confidential letters, courtesy letters, letters before death and so on, and raises a point of their historical value.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Plural Culture, Cultural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HAN Jia-bing

Multiculturalism is the important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which European and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en expounding the multiculturalism, We have to touch upon other two conception of plural culture and cultural pluralism that connected with the multiculturalism. China scholars usually confused the 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In fact, plural culture, cultural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not only have difference but also have relation.

(葛鉴瑶 译)